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

掌握命運

吳祖光◎著

吳祖光（1917～2003），本世紀中國在國際上影響最大、最著名、最具傳奇色彩的文化人之一。
江蘇常州人。著名學者、戲劇家、書法家。
曾在香港電影界任編導，是香港文化界和電影界的先導者。
曾任中國劇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青年讀本

費青迪題



C52
14P/2
青年读本

掌握命运

吴祖光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我唱过一首主题歌

我唱过一首主题歌

从1937年夏天开始，我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用大约一年的时间编导了两部影片：《风雪夜归人》和《莫负青春》，这是我从事电影编导工作的第一年。

大中华公司总经理蒋伯英先生是一个十分重视影片票房价值的老板。对于出品提出卖钱的要求自是理所当然，但是像我这样的编导能否拍出使他满意的卖钱的戏来却不容易。

一个纯商业性的影片公司把在祖国大陆被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视为眼中钉的戏剧工作者请到香港拍片，似乎是从我开始的。资本家敢于这样做，显然是由于他们是具有政治敏感的，大中华影片公司，以及新成立的永华公司陆续把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剧作家、导演、演员们纷纷接到香港，形成内地的电影、戏剧工作者云集香港的高潮。可见香港的电影企业家们已经不把苟延残喘的蒋家王朝看在眼里了。

我应聘去大中华之前，夏衍同志已经先期来到香港。他在编《华商报》，写政论小品，也写社论；一般情况下虽不公开露面，但在当时香港的进步文艺界以及从内地来港



我唱过一首主题歌

的文艺工作者中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我们的主心骨。遇有什么问题，大事小事，事事都要去找他请教。我到影片公司不久，蒋伯英先生就对我谈起他对夏公的仰慕，希望能有机会和夏公认识一下，但终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不久蒋老板又来找我，十分诚恳地转托我，要我代他转求夏公为他的公司写一个电影剧本，题材不拘，惟一要求能够早些交稿。为此我专程找到夏公，转达了蒋的意思，夏公当即答应了。

夏公下笔神速，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催他，他已经把手稿交给我了，是薄薄的约十几页的学生用练习簿的蓝色横格纸，实际是一个电影剧本的提纲，片名《女大当嫁》，是一个表现香港青年工人生活题材的喜剧。蒋伯英非常感谢夏公对他事业的支持，剧本拿去之后没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就送来一张支票要我转交作者，付给的是香港当时的最高稿酬。

《女大当嫁》立即积极进行筹拍工作，导演杨工良是大中华公司出名的快手，一个熟练的导演。他选定的主演是著名的红星李丽华，那时大中华影片公司聘请了当时中国影坛上最负盛名的两个女明星为公司拍戏，即是李丽华和周璇。周璇正在主演我编导的《莫负青春》。

《女大当嫁》很快就投入拍摄，大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拍摄完成了。记得蒋伯英曾对我说过，戏太简短了些，但这些问题都由导演去解决了。剧情我已完全想不起来，

配演的演员似乎有蒋锐、巴鸿、李露玲等，是至今仍在电影岗位上活动的同志。

在《女大当嫁》摄制过程中，发生了一桩我意料不到的事。导演和我商量，要我为这部影片写两首歌词。那时的电影常常要有插曲，尤其是片中主演假如会歌唱，就更需要唱几首歌。像李丽华、周璇这样的演员，新片出厂，片商来采购影片时，片中有几只歌亦是讨价还价的条件。这样，我就为《女大当嫁》写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歌是女主角李丽华自己唱的，另一首男人的歌，剧中男角不能唱，要另聘一位男歌唱家来唱。

作曲者陈歌辛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孤岛时期为当时出品的电影写过很多歌曲，风行一时。在我之前他已应蒋伯英之聘来到大中华任专职作曲，一到香港我便被接到蒋伯英的九龙界限街144号一座很宽大舒适的花园洋房里，同住在这所房屋里的还有周璇、李丽华、陈琦和孙景路。

我和陈歌辛同住在二层楼的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工作忙时几乎难得见面。那时拍电影经常夜间工作，因为白天杂音多，需要在夜静时拍摄同期录音的场面；所以我每次深夜或凌晨回房时，歌辛还在睡觉，而我起身时他却去工作了。陈歌辛是一个很好相与的朋友，博学多闻、富有趣味和幽默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十分愉快。他几乎每天都在编歌作曲，不仅为一个大中华公司，香港许多片厂

都来找他作曲、配乐。他也常常把新作的歌哼给我听。他唱出来的歌我总觉得不好听，但经过歌唱家一唱却变得十分好听了。所以我总说他是个很高明的作曲家，却是个很拙劣的歌唱家。他气了，让我唱，我就怪声怪气地唱，唱一些我熟悉的歌。因为新歌我唱不了，我不识谱，年轻时我曾得名师授乐，但我却笨得连识谱都学不会，老师很惋惜，说可惜了。我有一副好嗓子。

使我吃了一惊的是，忽然公司派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唱那首《女大当嫁》的男声插曲。我目瞪口呆，追问这个荒谬绝伦的决定是谁作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同屋的陈歌辛的主意。他说，就照我平时消遣的那种怪唱法，就正符合影片情节和人物的要求，我断然拒绝，但经不住歌辛不断的纠缠，我这人一向耳软心活，只得答应下来。

录音在界限街144号二楼宽大的阳台上进行。乐队练习，陈歌辛亲自指挥。李丽华轻而易举地唱了第一首歌。大家像看什么把戏似地围拢来看我唱歌。这一下把我弄得紧张起来，虽然歌已经练熟了，但是显然我的竞技状态不佳，平时的松弛不存在了，录了三遍才算勉强及格，急得我满身大汗。从此以后，我就更加佩服演员的镇定功夫了。

我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1948年出品、夏衍编剧、李丽华主演的影片《女大当嫁》中主唱了一首男声主题歌，是我从影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虽然在《中国电影发展史》

上显然没有记载这部影片。

为了更加确实一些，我去看望夏公。他记得确有此事，也记得《女大当嫁》这个名字，但是写的是什么内容连他自己也完全忘个净光了。

东安市场怀旧记

从来旧事物都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人有怀旧的天性，常常会想念昔日的风光而引起怅惘之情。听说北京地处最繁盛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不出两年之后，将会成为最现代化的商场而旧东安市场将会完全消失不留痕迹，这使我深觉怅惘。其实今天的东安市场早非旧时面貌，而最使我怀恋的还是那个在 30 年代我最熟悉的老东安市场。

我家是从江南北迁而来，父籍常州，母籍杭州，自幼惯听双亲的乡音，自己却讲满口京话。然而在学校还常受到同学朋友的指摘，说我字音不纯，尖圆不分。譬如“因音”、“程陈”、“正镇”就常常念错，教人笑话；自己亦深感惭愧，才知是听惯南音所致，费了很大劲才改正过来。

我生于 1917 年，至今虽老未龙钟；但显著的衰老现象却是记忆力的减退。往往刚拿在手里的东西，转眼便不见了；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在找东西。更为痛苦的是，刚刚相识的朋友，转眼便忘记了姓名；人家十分热情的过来打招呼，我却在费大力气苦想这人是谁；必要的话还要想方设法套出他的名姓。更使我狼狈的是最近一位来自台湾



的热情朋友到我家欣然道故，谈到当年我家住过的几处旧址；如何两人一起乘电车，我在车上讲笑话，把全车乘客都逗笑了；又如何和我一起爬墙上房去采海棠花等等往事……分明是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朋友，而我苦思冥想，至今找不出这段回忆。他的名字也毫无印象，糊涂至此，令我伤心惨目。

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一下家住北京的居处特点。父亲从20世纪初便从南方北来做事了。开始是借住在北京做大官的他的舅父家里，后来便迁居出去独立成家。当时北京住房情况与今日大不相同，闲房所在皆是，租房非常容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北京街头，不管大街小巷，在墙上，尤其是电线杆上，常常贴着“吉房招租”的红纸招贴，上写着：某街某巷、门牌号数，有几重院子，几间房子，每月租金若干。根据招贴地址前去看房，与房东见面洽谈，预付两三个月的房租便说定了。于是择吉搬家便住了下来。

我的双亲多子女，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中最大的，但是在我后面，母亲一共又生了六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生十五胎，除长姊和三、四、五弟早逝外，尚余姊兄弟兄十一人，是好大的一家。假如姊弟健在，正符合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之数。迄今为止，在我一生接触的亲朋好友之中，包括外国友人在内，尚无一保持这项纪录的人家。父母一生饱尝战乱之苦，包括太平天国之

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尤其是待我长大成人，更遭遇“反右”及“文革”之乱，两次大乱我都是罪魁祸首。由于母亲对我的深爱，越是困难，虽有众多子女却不肯离开我家，父亲歿于“反右”次年，母亲则坚持到“文革”以后病故。

写以上一段与东安市场似无关联的住房情况却为的是说明一下我青年时代及远游归来重新定居北京的往事。

父亲一生精力饱满，很少见他休息。我只记得他在做官的时候上班下班十分认真，下班回家，不是读书便是写字、作画、而且高声吟诵诗词。收藏文物字画是他终身癖好，而现在回想，他还有一项癖好乃是搬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记不清楚我家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几年中搬过几回家了？能够想得起的地址有：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这六处，而我诞生之处是舅公庄大人的小草厂一所大宅院，北京不止一个小草厂，这是位在东城的小草厂。这七处居住过的宅院，除景山后太平街一处之外，全在北京东城区绕着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父亲的酷嗜搬家引起深思。谁都知道，搬家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麻烦事情，从收拣什物到装箱、转运、打包；再解包、安置，多么辛苦！远的不说，近年来，两位老友夫人由于搬家过劳致命，一位是钱昌照先生的夫人沈性元女士，另一位是叶浅予先生的夫人王人美



女士；众所共知，令人扼腕。而我的母亲，由于多次主持搬家，又忙又累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爱好搬家，我现在想来，除去他生性好动之外，与他的多子女不无关系。孩子多了，奶妈也多，我记得我家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奶妈；觉得拥挤不够住了，就搬家。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个“故都”北平——北京在我印象之中，很长时期以来是人口在七十万左右，整所的空房、四合院随处皆是。无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戏园饭馆，很少拥挤现象；戏园影院虽然满座，亦大多秩序良好。父亲以搬家为乐，亦正由于他爱新鲜，从容搬迁而不觉其苦。更为有趣的是，在我从十九岁离开北京的老家独闯江湖，历经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江安、成都的八年抗战；再到上海，出走香港之后，于1949年回到北京，先住东单栖凤楼，又离东安市场不远，而到1954年为了把上海的父母亲接回北京买了帅府园马家庙的一座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所在地竟然贴近了王府井大街，出来进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东安市场。

一场无理取闹、发展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从马家庙私宅赶了出来，逼得我迁居到较远的和平里，“文革”结束后又被移居到朝阳区的东大桥；自己旧居的两个院子、十八间房子都白白送给国家了。这使我至今的最后二十六年离开了王府井，亦即远离了东安市场；偶尔去到那里，总难免感到点黯然神伤；虽然现在的东安市场早已大大地改了旧时的面貌。

正是由于对东安市场存在一种难于忘却的怀旧的感情，所以听说东安市场、甚至连同王府井大街的原貌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从北京东城的这块土地上消失，而接到要我写一篇旧东安市场记的任务时我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

东安市场创建于1903年，而我经常出入市场当是在建场之后的1930年，我年纪在十三岁左右的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是母亲带我去逛市场，然后东安市场便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块磁石；更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的母校孔德学校，地处东华门大街，与东安市场近在咫尺。因此每天学校下课之后东安市场便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我至今记得，当时北京人把东安市场比作：“马连良”，意为“没黑过”。在那一段很长的局势动乱、百业萧条的时代，印象中的东安市场却永远是熙来攘往。正如一代京剧明星唱老生的马连良一样，在舞台上占尽风流。然而北京人不知道，而我却亲眼目睹过，在1949年香港，九龙普庆大戏院，马连良也赶上过最“黑”的时刻。记得那次大约是春天，我从香港过海回到九龙，走经弥敦道普庆戏院门口，一看墙上大海报当晚马连良演出的戏码就吃了一惊，他演的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公。不由得买票进场，并且进到后台；见到马先生说了两句问好的话，他忙着上场我就走出了化妆间；只见他的“箱官”坐在大衣箱上叹气，对我说：“跟了马老板二十多年亦没见过他这个唱法……咳……”一边说一边

摇头。待我走进场，看见剧场里冷冷清清不过坐了四五排寥寥的观众就更觉伤情惨目，坐不到几分钟便出场回家了。落得这般光景主要在于香港不是京剧的天下。又赶上时局动荡，大陆行将易手以至也影响了香港。当时我也不知马先生何自而来到香港，看来这确是他一生最“黑”的时刻。当然，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横遭凌辱至死，更是惨绝人寰，成为千古遗恨。但是，东安市场却从来都是兴旺的。

很多往事都记不得了，可是我却时时记起在东安市场的一所叫做明星的电影院，由父亲带着去看过一部国产影片。名叫《孤儿救祖记》，甚至我如今还能回忆起它的某些画面和场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是黑白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摄成于1923年。我的座位在楼上右侧，是一排一排的长木凳，记忆中这影院即是如今吉祥戏院的前身。但是却从来无人提起，我亦一时找不到人来对证，亦再不记得在这里还看过别的电影。而吉祥戏院直到如今从来都是以演出京剧、昆曲，以及传统及现代题材戏曲节目的剧院。

到我十五六岁成为一个真正京剧迷的时候，经常去看戏的剧场是前门外的广和楼而不是吉祥戏院；东安市场最吸引我的地方亦不是吉祥戏院而是戏院左侧的一片空地叫做杂耍场的地方。杂耍场里品类繁多，有变魔术的、摔跤的，攀杠子练武术的，拉洋片的，踢毽子的，说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说相声的。

那段时期，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演员名叫赵嵩如，捧哏的演员很年轻，名叫做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他那装傻充愣的憨厚样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相反赵嵩如的模样倒记不真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其中很大成分被人叱之为耍贫嘴，而耍贫嘴并不见得就会讨人嫌，有时常会把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甚至不无哲理。也时时给人灌输某些知识……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同学下课之后又去了东安市场，直奔赵嵩如的场地。这次同去的有一个女同学，赵嵩如一见到就对姑娘鞠了一个躬，说：“小姐，您到那边儿瞧变戏法儿的去吧。我们这儿不文明。”虽然不知道有啥不文明，女同学却臊了个大红脸转身跑了。第二天上学就骂我们缺德带她去听相声，并且问到底是个什么“不文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相声场子里司空见惯，赵嵩如一见有女客来就是这样把姑娘、小姐们打发走。这回是女同学要跟来，我们有什么法子？

是怎么不文明呢？相声表演里有时说些荤话，就是现在的所谓“黄色”，如此而已。其实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譬如专唱京戏的广和楼，当时就不卖女座；亦是由于剧目中、或是对话里有点“荤”的原故，也就是涉及了两性关系的“性”的问题。说它是民间文学的传统绝对没有丝毫的夸张，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或是剧本大都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写的是生活，而性是生活里的主要部分。



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针见血的真理，是延续个人、种族、国家的真理。但性又是必须遏制或是控制的，否则便会产生难以想像的恶果。从古以来都为此设置种种的戒律与禁条，历来无论是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都是道貌岸然地训诫他的臣民和后代儿孙。但是这些人物自己却背着臣民和儿孙干着同样的勾当甚或更为恶劣，这本身便是一种不文明的滑稽表演。近年来常常在报纸上登载着教育部门关心着在学校里如何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以免由于无知而引发什么不测的后果。提起当年我在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听相声便不由得联想起我最初受到的一些性知识竟是从赵葛如的相声里听来的。相声是滑稽表演，而生活里的两性关系也同样是很滑稽可笑的，但它就是生活。

所以在生活里听到严厉的家长训叱子女和高层领导发号施令；我总觉得十分滑稽，马上就会产生联想。

听相声和看别的杂耍一样，都是听完一段就往演员捧过来的筐箩里或地下扔钱。那时候兴用铜板，分大的小的两种，一个大的等于两个小的，扔一个两个就行了。也有不给钱转身就走的，一般坐在四周长板凳上的都会扔钱；而站着听的有些就不给钱了，甚至在一个节目快完之前，没等收钱就先溜了。因为演员会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对不给钱就走了的，也会说几句损话，所以不等说就先溜。

所有的表演都是这样要钱的。杂耍场里除上面说的一

些项目外，还有算命的、卜卦的、代写书信的，旁边还有小茶馆……但这些地方我都没什么兴趣。

杂耍场是露天的，顶上没有遮盖，碰上阴天下雨便冷清没人来了。

还有我至今记得的是杂耍场里长年停着一辆独轮大板车，上头挂一个一尺多长的牌子，写的是：河间包子。老板是一个中年的胖大汉，夏天光膀子，冬天穿大棉袄。猪肉包子一屉接一屉蒸出来，热气腾腾，开屉就吃，总是顾客不断。至今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这里的河间包子是最好吃的包子。

当然，学生们下了课到市场，除了玩就是吃。本来“民以食为天”嘛，市场的第一要项就是吃。我这里说的吃，不是说吃什么山珍海味，学生嘛，不过吃一些平常的食品。但现在写吃却也难免要和当前做一些对比，对比之下我总觉得现在过分地铺张浪费了。就譬如吃涮羊肉吧，东来顺至今是涮羊肉的王国。当年的东来顺好不威风，门前两边一顺摆着十来个直径约近三尺的大树杆锯成的砧板，每块砧板后面站着一个又胖又壮的彪形大汉，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又薄又亮的大片刀切削羊肉，把整块的冻肉切得纸一样薄。这是专业的切肉师傅，据说当年每人每月的工钱约为三百银元，够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真够气派。而涮羊肉并非多么高贵的食物，吃一顿花不了多少钱，当年即使穷学生也能吃得起。但联想到今天却令人感慨：今天的



宴席上如果主题是涮羊肉或是烤鸭，却总是先上四个或更多的冷盘，再上四个乃至八个、十个热菜，等到主题的涮肉或烤鸭上来，座上客人早已吃得心灰意懒周身犯困了。更使人惊讶的是饮食业近年发展的一门“食品”艺术加工业，把食物精心刻制成花朵或动物的形状，把一个大萝卜的红心雕成各种花或龙凤鱼鸟的形状；但无论怎样加工精雕细刻，你能雕刻成真花真叶真动物那样吗？而且把龙凤花鸟咬在嘴里又是什么味道？这真是走火入魔进入邪门歪道了。中国菜的传统讲色香味，与这种“雕刻艺术”全不相干。我想这不算过激之论，且与东安市场也不太相干；但我是缅怀昔日以及老东安市场在食品业方面务实、本色、简朴之风而发发牢骚的。

逛市场在吃的方面说不过来。使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母亲带我去看病，然后同乘一辆人力车从西城回家，但是经过东安市场时去到五芳斋去为我叫了一碗蟹黄面。我低头大吃，母亲满面笑容地看我吃，说：“慢慢吃，回家出身汗就好了……”这是一碗南方如上海一带的汤面，真好吃，从此以后我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第二碗。

另外还有一家其规模不下于东来顺的润明楼，建筑开阔宏大，但却是个非常平民化的饭庄，菜很便宜，而且每张台子上都经常摆着四碟小菜，虽然都不过是酱豆腐、咸黄瓜、咸水花生、泡酸白菜之类，但都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大馆子，小价钱，是学生、寒士们常